

錢鍾書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宋詩選注



I222.744
Q276.02

钱锺书集

宋诗选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I 222.744

Q 27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诗选注/钱锺书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5 (2003.1 重印) (2003.8 重印) (2004.7 重印)
(2005.4 重印)

(钱锺书集)

ISBN 7-108-01676-1

I. 宋… II. 钱… III. ①古典诗歌-注释-中国
-宋代②古典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宋代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575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75

字 数 328 千字

印 数 25,001-3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錢鍾書集



出版说明

钱锺书先生(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年)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著述,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为了比较全面地呈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经作者授权,三联书店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钱锺书集》。

《钱锺书集》包括下列十种著述:

《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

这些著述中,凡已正式出版的,我们均据钱锺书先生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其中,《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钱先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订。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多次再版时,这些修改补订都未能排入原书正文,只是缀于各书的卷尾,读者阅读时颇感不便。此次结集,我们根据钱先生的意愿,对这几部书进行整理,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另外,我们还订正了少量明显的错讹。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

历史原貌，一般不作更动。

《钱锺书集》由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文稿和样书；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陆文虎先生和马蓉女士分别担任了《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编辑工作。对以上人士和所有关心、帮助过《钱锺书集》出版的人，我们都表示诚挚的感谢。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继《钱锺书集》繁体字版之后，我们又出版了这套《钱锺书集》简体字版（《谈艺录》、《管锥编》因作者不同意排简体字版除外）。其间，我们对钱先生著述的组合作了相应调整，并订正了繁体字版中少量文字和标点的排校错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日

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代 序)

杨 绛

我谨以眷属的身份，向读者说说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因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写序。

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但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锺书觉得说来也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锺书集》。随后

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锺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

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晓，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创作，都不大满意。尽管电视剧《围城》给原作赢得广泛的读者，他对这部小说确实不大满意。他的早年作品唤不起他多大兴趣。“小时候干的营生”会使他“骇且笑”，不过也并不认为见不得人。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锺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诤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锺书笔下而已。

钱锺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钱锺书先生五十岁时与夫人杨绛先生合影

宋詩選註

序

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①。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②。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③。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

① 郝经《陵川文集》卷十《温公画像》，赵访《东山先生存稿》卷一《观舆图有感》第四首自注。

② 《剑南诗稿》卷十二。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五十四载吴伸《万言书》里还引了宋太祖那句话来劝宋高宗不要“止如东晋之南据”。

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①；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②。宋初有人在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么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饿：“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③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实，人民负担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选的唐庚《讯囚》诗就老实不客气地说大官小吏都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抵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打仗要军费，打败仗要赔款买和，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透露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④。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⑤

①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费疏》。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

③ 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卷二《悯农》。

④ 《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⑤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题黎芳洲诗集》引了这两句，还说：“所谓长歌之哀非耶？”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单就下面选的作品而论，也可以看见几种不同的方式。

下面选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

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像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①。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②。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③。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地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① 参看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一千四百五十一(乙)、一千四百六十(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麇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麇论》)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地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地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

② 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六十八载杨造“乞罢和议疏”讲到沦陷的人民，就说：“窃恐岁月之久，人心懈怠。”

③ 参看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卷一《乾道乙酉进美芹十论》里“观衅”第三。

下面选了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释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这是又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但是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里面说：“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①这首诗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时候作的^②，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讽喻就跟萧立之诗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谈之类的长诗、邹浩的《悼陈生》^③，诗很笨拙，但是叙述的可以说是宋版的桃花源^④。有个宁波人陈生，搭海船上南通泰县一带，给暴风雨吹到蓬莱峰，看见山里修仙的“处士”，是唐末避乱来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谁氏？’语罢默默如盲聋”；这位陈生住了一阵子，又想应举做官——“书生名利浹肌骨，尘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个处士用缩地法送他回去，谁知道“还家妻子久黄壤，单形只影反匆匆”，陈生就变成疯子。邹浩从他的朋友章潜那里听到这桩奇闻，觉得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而不

① 《浮溪集》拾遗》卷三。

②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六。

③ 《道乡集》卷二。

④ 这桩奇闻当时颇为流传，例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就有详细的叙述，还说：“又闻舒信道尝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南宋初康与之《昨梦录》记杨可试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大穴”，内有“大聚落”，可供隐居；也正是桃花源的变相。

能遇仙，陈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两莫遂，我虽忘情亦歛歛；仲尼之门非所议，率然作诗记其事。”邹浩作这首诗的时候，宋徽宗还没有即位，假如他听到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释教，以他那样一个援佛入儒的道学先生，感触准会不同，也许借题发挥，不仅说“非所议”了。邹浩死在靖康之变以前，设想他多活几年，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痛，又听得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样一个气骨颇硬的人，感触准会不同，也许他的“歛歛”就要亲切一点了。只要看陆游，他处在南宋的偏安局面里，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①，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②。这些诗人十之八九从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经过科举保举，进身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地对抗

① 《剑南诗稿》卷二十三《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

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①；北宋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了威胁，连这一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直到南宋灭亡，遗老像龚开痛恨“乱臣贼子”的“祸流四海”，才想起宋江这种“盗贼之圣”来，仿佛为后世李贽等对《忠义水浒传》的看法开了先路。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②，不像在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③。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壎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④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

① 魏禧《魏叔子诗集》卷一《读〈水浒〉》第二首：“君不择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于此！”

② 例如宋庠《元宪集》卷十《坐旧州亭上作，亭下是梁山泊，水数百里》：“长天野浪相依碧，落日残云共作红；鱼缶回环千艇合，巷蒲明灭百帆通”；韩琦《安阳集》卷五《过梁山泊》；苏辙《栎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第五首：“菰蒲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

③ 例如《元诗选》三集庚陆友《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十七《分赃台》（参看李贽《焚书》卷五“李涉‘赠盗’”条），朱彝尊《明诗综》卷五胡翰《夜过梁山泊》，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五载丘海石《过梁山泊》。

④ 《隐居通议》卷七。